

=====

文革博物馆通讯（八五七）·华夏文摘增刊第一〇二五期（zk1604a）
中国新闻电脑网络（CND）主办

=====

（二〇一六年四月四日出版）

本期目录

【亡灵祭坛】	往事真情	孙 耘
【微观历史】	是红卫兵打死了卞仲耘吗？——兼谈宋彬彬的道歉	陈闯创

本期通讯所刊载的材料已经全部增补到网上《文革博物馆》“最新展出厅”及各有关“展厅”，欢迎前往浏览，网址为：<http://museums.cnd.org/CR>。

【亡灵祭坛】

往事真情

• 孙 耘 •

今年9月28日是挚友时作隆（1945·8·1—1984·9·28）逝世30周年的日子。众多好友亲朋，或齐聚一堂，或网络传书，共同挖掘遥远的记忆，抒发当今的感怀。往事真情，思念无尽。谨撰此文以慰作隆及诸亡友在天之灵。

一、一段往事：“二闲堂”与时作隆的故事

我关注“二闲堂”网站始于10年前，是一位在美国的友人相告，那里有章诒和怀念前辈的一些文字，很值得一读。

2005年底，看到二闲堂堂主唯一先生的《读‘访蒯’有感》，大意是，读了田炳信的《采访今日蒯大富》，回想起当年在中学同学“老施”家见到他的兄长——一名因武斗致残的清华井冈山战士，由此引发了一些感想。他写道：老施兄长命运的转折是源于一次武斗。那次，他刚从外地回来，到学校随便看看，不想“井冈山”正在强攻“四一四”占据的教学大楼，正是难解难分之际。指挥作战的蒯某见到老施的兄长身强力壮，于是命令他带几个人顺着已经架起的木梯，爬上楼顶助攻。“士为知己者死”是中国的传统道德，老施的兄长连想都没有想就冲了上去。

正在就要得手的时候，被上面“四一四”的人发现，赶紧用力推翻支在楼角的长梯。长梯轰然倒下，老施的兄长从三层楼高的地方摔将下来，自己一方的人马拼死救了回去，立刻送到医院。可回天无力，只抢到了性命，却没有能够救起瘫痪的下半身。

事后，“老蒯”亲自到医院慰问。让人略为舒心的的是他对老施的兄长说的这样一句话：“尽管放心，你这一生我包了”。一个二十郎当岁的青年，眼看从此就要瘫痪终身，不知前途如何，这个时候还有什么比这个许诺更能叫人指望的呢。

多年后，唯一先生回国时，得知“老施的兄长”早已去世，遂感慨道：切记不可相信政治家的许诺，大到“跑步进入共产主义”，小到“你这一生我包了”。这倒不是说政治家的人品一定低于普通人，而是说，在一个政治起伏不定的社会里，政治家自身都尚且朝不保夕，他的许诺能有几分值得信赖的呢。

文中提到的“老施的兄长”我很熟悉，就是清华足球队的前锋、企92班学生时作隆。这是我见到的第一篇有关小时的文章，很受感动，就致信唯一先生，讲述了小时的一些情况和清华同学的情谊。唯一回信希望在网上发表。出于慎重，我又再次与老同学及小时家人进行沟通，得知唯一曾就读于北京四中，与小时的弟弟确实是校友且相识（只不过将“时”误记为“施”）。2006年，我这篇“有感的有感”就以“北南”的笔名发表于二闲堂纪念文革四十周年的专栏——四十年细说从头。对我来说，主动而不是被迫地拿起笔来回顾文革的经历，诉说自己的所思所想，这是第一次。

这是一段“往事的往事”，一如章诒和女士那句掷地有声的名言：往事并不如烟。因此，特将当年“二闲堂”上的文字照录如下：

唯一按：文革过后四十年，有人出来发话说：“不纪念文革四十年”。当然，这是废话，这是一厢情愿，事情本由不得他做主。譬如，我读了《“访蒯”》一文，于是就有感而发；旁人读了我的《读“访蒯”有感》于是再有感而发，这有感的有感让我更加有感。这就是纪念，这是没有人可以钳制住的纪念。北南先生的纪念文字续写了文革过后的往事，那些被我们渐渐淡忘掉的往事。而这些往事让我不得不对这些文革过后依然顾念旧情的人们有感。

（北南：《读“访蒯”有感》背后的故事（见本刊zk0905c，此处从略））

不觉之间，又过去了八年，小时依然没有离开我们的记忆。多少次大家围坐在一起，请来小时的哥哥、姐姐和弟弟，一起追忆他的音容笑貌和点点滴滴的往事。

二、正印前锋：“地里排子”时作隆（略）

三、相从同越千山毕，南北丹心共拍节（略）

四、5·30之殇

百日武斗期间，时作隆作为团派“罗文李饶专案组”保卫组的一员常驻清华200号（核研院），他们的头头是身材魁梧的羽毛球运动员李木松（水七）。

像当年的羽坛名将汤仙虎、侯加昌、陈玉娘一样，李木松也是印尼归国华侨，但他属于归国华侨中少有的“红五类”——三代（包括他本人）都是矿工。李木松曾在我国大使馆协助工作，印尼排华时，受大使馆指派，参与管理一条船的归国华侨。他为人仗义，有头脑有主见，生活和社会经验丰富，因而威望很高，自然而然就成为专案保卫组这伙人的头头。他深知武斗会有什么后果，就顶着来自各方的巨大压力，坚决不同意回校参加武斗。后来大家都感慨：多亏了大木松，不然的话，出事的就绝不只是时作隆一个人了。

1968年秋，李木松和他的系友胡总一样，分配到刘家峡打洞筑坝。经热心同学牵线搭桥，他最终成为小球队一位女同学的姐夫，在唐山筑起爱巢，不久又喜得贵子。可惜美满

的生活不长久，在1976年大地震中李木松同学不幸罹难。直到三十多年以后，那些身处港澳的华侨同学还在感叹：如果木松活着，就能把大家聚拢起来，一起干些大事业。

既然专案保卫组的人都“躲在200号”没有参加武斗，5·30那天时作隆是怎么冲上武斗第一线的呢？这个问题至今令大家困惑，没有圆满的答案。

关于清华的“百日大武斗”，唐少杰教授在其专著《一叶知秋》中指出：“它不仅成为文革的重大事件之一，而且影响到文革的进程以及红卫兵运动的命运。”而5·30武斗正是百日武斗中规模最大，持续时间最长、伤亡最重的一次武斗。就冷兵器武斗而言，其惨烈程度可与闻名全国的上海工总司砸上柴联司事件相比肩。

近十年间已有多位同学著文从不同角度、以不同形式描述这场武斗。李自茂同学（汽九）今年出版了自己的新著《毕竟东流去》（中国文化传播出版社，2014），其中第三篇“四十年前的那一天”用6万余字的篇幅专门记述5·30武斗。

当年李自茂是团派西区武斗队负责人之一，更是“5月30日武斗的‘策划、组织和指挥’者之一”。他特别强调：这里所披露的是四十年前的一段回忆，杂糅了几位亲历者的补正。早在四十年前的今天，派驻清华的军工宣队就多次让我详尽地回忆我在武斗中的经历。……在我寥寥的留存中，所幸找到了当年书写的那份材料底稿。还应告白的是，我对清华“5·30”的回忆也不止那一次，以后在“批清”、在“清查”中又得以再二、再三的回忆与交待，直至1986年元旦才画上句号。唯其如此，本人相信我的回忆文字更具史料价值。

李自茂是严肃认真的。2008年夏，一些团派旧友，包括蒯大富等头头专门聚会在新疆，边回忆边讨论这篇文章的初稿，其后才在校友网发表。网友评论：李自茂勇于承担，不居功，不诿过；此文是“描述文革武斗过程最精彩的一篇，不仅真实可信，情节文笔俱佳，而且画龙点睛式的议论让人不得不掩卷而思”。及至成书出版前，又根据近年网友们提供的新资料作了修订。

关于5·30武斗的‘策划、组织和指挥’，李自茂写道：“5月29日（此日期是事后知道的，在那些日子里，身边没有日历，也不看日历，分不清今夕是何夕），晚上8点过后，郭福新和张庚从2号楼回来找到我，对我说，据四号楼楼顶的观察哨报告，通过几天来的观察，守浴室的大概只有七八个人，今天白天正在架电网，尚未完工，如果今天晚上带几个人去偷袭一下，肯定可以把浴室楼占了”。李自茂被他们说服，认为“可以一试”，于是汇报给总部鲍长康，又召集几个区武斗负责人开会商议。尽管“周大卫提醒说不能掉以轻心，头一天他们捉到老四总部委员吴栋，在他身上搜出一张纸条，要求加强对浴室的守卫，可能守楼不止8人”。但是“我对此没放在心上，大家也没就此警惕”。最后，鲍长康一锤定音：“统一大家的意见，定下来今晚行动，以偷袭为主，不成就强攻，重点在打援”。鲍长康自任总指挥，给几个武斗队分配了任务，任命李自茂为“现场总指挥”。此时为晚间11点多，武斗队员多已进入梦乡。他们回到9003大楼，匆忙把人叫醒开会，作战前动员，确定分工，分头准备。从9003出发开始行动的时间是凌晨一点多。

百日武斗时我正在公安局被拘留审查，有幸躲过一劫。2008年在新疆第一次听李自茂讲述这段历史，我倍感惊诧：这样一场伤亡重大的武斗，居然是几个人仅凭表面的观察加猜测，在短短2、3小时内就做出决策并付诸实施的。老团似乎没有参谋班子，所以既不做情报分析，也没认真制定作战计划，甚至没有检查武器工具等勤务设备是否实用可靠，以致偷袭不成被迫改为强攻；遭遇强攻受挫、人员伤亡后便不知所以，指挥既无力又无序。李自

茂描述：“在现场鲍长康召集过两次会，商量对策，在校的团派总部委员几乎都到了现场，没人提撤不撤的事，那已不合时宜。开会已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会，与会人很乱，围成一圈，圈外还围了不少人，七嘴八舌，没个准主意”。乱纷纷中仅凭老团战士的勇敢精神前赴后继地攀梯攻击，当然敌不过老四战士顽强并有充分准备的防守。团派的表现就像一群刚刚揭竿而起的乌合之众。时作隆就是在这种背景下临时充当攻击队员，导致摔伤残废的。

罗文李饶专案保卫组这批业余运动员膀大腰圆身强力壮。武斗开始以后，团派总部就一再要求他们回学校参加武斗，遭到专案组的拒绝。有一次把李木松逼急了，就大声吼道：“我们绝不参加武斗，我家里还有六十岁的老妈妈哪！”把蒯大富顶了回去。

然而，保卫组里每个人都承受着巨大的思想压力。一方面被参加武斗的老团——许多是自己同班的或熟识的同学——骂为“胆小鬼”、“怕死鬼”；同时自己的内心也很纠结，是不是“革命意志”不强，“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不够坚决？因而，有部分成员赞成听从总部调遣参加武斗，小时就是其中之一。小时还有一点武术功底，摆出架势摔跤，身高马大的同学都不是他的对手。

事有凑巧，5月29日，包括小时在内的一些专案组成员回校办事，第二天一早听说发生武斗，都跑去观看，为自己一派呐喊助威，有人还帮助甩甩石头。李自茂说，那天“团派的人太多，估计千人以上，浴室楼已被围得水泄不通”。

当然，围观者两派都有。工物系414的小鹰同学在校友网上写道：那天早上，我在工化系楼道里听到喊声：“快去看武斗！”我和燕生便随着人流走，过了十饭厅后边的那条小河，便有老团的武士不让前进了。聚在那里围观的有几十人，远远可以望见东区浴室的战斗。老团几次试图以云梯强攻亦未遂。修缮科工人段洪水从梯上被挑，摔下来当场死亡，足球队の時作隆又被人怂恿作了先锋。我后来听到在场的同学说起，当时有人喊道，“小时行，让小时上！”……

小鹰没有说是谁在怂恿小时。首先可以肯定，不是唯一先生推测的那样，“指挥作战的蒯某见到老施的兄长身强力壮，于是命令他带几个人顺着已经架起的木梯，爬上楼顶助攻。”因为，蒯某并没在现场“指挥作战”，他也不认识小时。老蒯自己回忆说，“我们攻不下来。我就下了死命令，叫他们不要再冲。他们还往上冲。”（许爱晶：《清华蒯大富》336页）但是，按李自茂等人的回忆，策划过程中并无向老蒯请示汇报的环节（其权威不过如此）。老蒯也没出现在武斗第一线，谁都没听到这样“不合时宜”的命令。下“死命令”一说属于典型的蒯氏风格，不过是今天想当然的回忆。斯时斯地，即使有这道命令，也必然是“胎死腹中”的命令了。

可见，并没有什么人命令小时往上冲，同去的专案组成员也没有鼓动他上阵。相反，据陈奋光（物八，小球队）回忆：木松当时就严禁任何人回校去参加武斗。我们远远的观看，就看见有一个老团拿着长矛往上攻，在攻上屋顶前被老四抓住长矛连人一起推下梯子。我们惊呼，后来才知道这个老团就是小时。出事之后木松一直自责为什么管不住自己的队员。他跟我说过好多次：如果那天我不同意回校，就不会有这个悲剧了。

显然，武斗现场的环境气氛才是驱动小时上战场的重要原因。

那是一种什么样的环境气氛呢？李自茂在“跋语：回顾与反思”一章中有这样的叙述和分析：

团派的许恭生死于天亮前的打援时，当时四派的人跟着土坦克从东大操场（高压试验室方向）冲过来，许带队后撤，在后撤中，许的位置突前，被石头绊倒，四派有二十多支长矛（据沈如槐说）刺向许。许穿的是正规的军用刺杀服，有较好的抗刺力，有人将其下摆挑开，刺中了股动脉，致其流血过多，在送医院途中已不治。有人说（如唐金鹤在《倒下的英才》一书中所述）许自恃武艺高强而一人突前，这是不厚道的，我以为当时他更多考虑的是自己的责任。甚至有人说老团耽误了救治，致使许身亡。这是至今被派性糊住双眼的人的臆语。我们那一代人都有强烈的责任感……制九高子正同学肯定地说许恭生为掩护战友而拖后，是尽责的表率。这才是恰如其分的评论。

高子正在《5·30难以忘怀的碎片记忆》中写道：〔见本刊zk1509b，此处从略〕

李自茂进一步分析：

许恭生是5·30那天死亡的第一人，他的死对全天形势影响至深。

如果许恭生仅是受伤，团派眼看攻楼无望，肯定会偃旗息鼓，老团本来也没准备强攻。由于他的阵亡，激起了团派特别是东区同学的义愤，全体一致要求“报仇”。报仇的意识在当时的场景里出现，毫不奇怪，平静如水才是不正常。许恭生在武斗中伤过四派多人，四派出于“报仇”意识在其倒地后仍将其刺死，手段足够凶狠，而这又激起团派的报复，从浴室南面和东面的一次次地攀梯强攻全是在“为许恭生报仇”理念驱使下的东区团派的行动，使一场偷袭演变成大型武斗。

许恭生，冶金系焊8班学生，1962年从江西南昌考入清华，参加校击剑队开始正规训练，没几年就获得高校重剑冠军，在体育代表队里有一定名声。许恭生文武兼备，文革中是28团的干将，团派里知名的辩才（戏称“嘴皮子”）。武斗爆发，属于稳健派的他义不容辞地留校担当刺杀教练。我听说，他执教时强调不要刺致命处，以使对方丧失作战能力为目标。许恭生曾刺伤好几位414战士，不知有没有致命处的伤情。我相信在战场对垒中他会尽力按自己的原则行事。

5·30清晨许恭生的阵亡引发老团一片“报仇”的激愤情绪，随即奋不顾身地发起一波又一波攀梯强攻。小时就是在这种气氛里披挂上阵的。

我们无从知道斯时斯地小时都想了些什么。或许，他想到了“捍卫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使命，正是这种使命感让他不顾兄长的劝阻，执意回校参加运动；或许，他想到队友王庆章还关在看守所，为拯救自己的哥儿们一定要打败老四，决不能在战场退缩；或许，他知悉许恭生已经牺牲，耳听一片“报仇”声，眼看团派战士接二连三从房顶跌下，便义不容辞地披挂上阵，想凭借自己的灵巧和武功冲破老四的防线，打破僵局；更可能，他根本来不及想这些，只是激愤和冲动之下的行为。

文革中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心路，并主导着自己的行动。如李自茂坦率地承认：我也有过动摇，但因在派中处于一定的负责地位，慑于舆论的压力而选择了留下，担心被本派的人视为胆怯，骂成“逃兵”。当年我的母亲到学校哭着劝我离开，我拒绝的理由就是“别人会骂我是逃兵”。一旦选择留下，我就按自己一贯的行事风格，积极而认真地参与武斗。同样，时作隆也有自己的心路，其行为不是简单的“被人怂恿”四个字所能解释的。

小球队的张存和同学（化九一）目睹了小时受伤的全过程。他在自己的乡间别墅向我讲述道：

清华百日武斗期间我就在学校，是逍遥派，一有武斗就去看热闹。5·30那天，我看见时作隆穿戴着全套刺杀护具，拿一支较短的扎枪，因为要翻屋顶上的铁栏杆，长了不行。我和小时都是代表队的，认识但不很熟。我说了一句：这行吗？加小心呀。小时还说：这护具刺不透，没事。我记得他是从靠外墙那边（北边）上去的。整个过程我在下边看得清清楚楚。这一拨小时第一个上去，后面跟着第二个、第三个。那时，周围的团派不断向上边扔石头、砖头，老四的人就趴在屋顶弧形连接处的沟里。小时乘机爬上去，但翻不过铁栏杆，只好从中间钻。还没钻过去，石头一停，老四的防守者就拿着更长的长矛站起来迎击。小时只好退回站到栏杆外不足几十公分宽的边沿与对方拼刺。短不如长，小时不得不边拼刺边向一侧退去，同时让出口子让下一个人上来。后来对方一枪刺到他胸口处，他趁势抓住对方长矛，并夹在左腋下，右手顺势刺出去，要夺枪。对方一见，就往前一推，一松手，小时两手各抓着一根长矛，就仰面朝天摔了下来。浴室北边地势较低，至少有三层楼高，地下满是碎砖头，所以摔得很重。我见状上前将小时背上汽车（唐建民开车），直接送往积水潭医院。当时我一直陪在小时旁边，后来又轮流值班护理了很长时间。那时我常和小时聊，有些细节还是他讲的，与我看到的情况一样。

张存和有一个积存多年的心结：这是我非常后悔的一件事，如果我们懂得摔伤人如何救治，不去拽他背他，或许不至于截瘫。我内心十分纠结，很长时间情绪不好，觉得对不起小时。在医院里小时倒反过来安慰我。毕业后我也给他寄钱，寄了好几年，但没寄到最后。

积水潭医院的手术治疗挽救了小时的生命，但第四胸椎以下完全瘫痪。小时对我说过：在仰面下落时我做了一个曲腿收腹的动作，不然大头儿朝下落地，说不定就玩儿完了。确实，比起段洪水和马跃开，小时还算幸运的。

段洪水1965年初中毕业，招工进清华，在修缮科当瓦工。文革中参加团派的工人组织“工总司”，是其武斗队“红缨战团”的成员。5·30攻打浴室时面部中枪，从楼顶跌下，头部受重伤，经抢救无效死亡，时年仅19岁。小段出生在一个工人家庭，下边还有三个小妹妹。痛失长子独子对这个家庭是多么巨大的打击！兵团总部也只能从卖井冈山报的收入中拿出3000元钱表示抚慰之意。遗憾的是至今无法寻到小段的照片。

马跃开是数力系0字班学生，后休学到力004班。他出生于苏北农村，家境贫寒。父亲是老新四军，在抗美援朝作战中负伤，耳朵被震聋，且有轻微痴呆，属于伤残军人。刚强的母亲一手撑起这个家，养两个儿子成人，还将小马送进清华。马跃开在5·30武斗中受重伤成为植物人，在1974—75年间去世。2008年10月，通过他同班的李建国，我电话采访了知情的张冠忠同学。他说：

我们数力系武斗队驻扎在旧电机馆，属于大礼堂区，5·30那天都被拉出来到东区参战。清晨约4点钟，我们就埋伏在东大操场南边坡下，准备打阻击。这支队伍中有数力系30多人，在靠南头；许恭生他们应当在东操场靠北边浴室附近。团派的阻击队伍至少一百多人，整个参战人数应当更多。天蒙蒙亮时，老四队伍从动农馆那边过来，人数虽然比老团少，但有一辆土坦克很厉害。由于土坦克的冲击，阻击队伍且打且退。我们三人一个战斗小组，我居中，马跃开在左，童鲁在右，后退到大操场百米跑道终点处，马跃开被裁判用的铁架子绊住，慌乱中眉心中了一长矛，随即倒下，后脑跌在铁架上磕伤。我赶紧上去抢人，腿上也中一枪，幸而不重。当时我们还没觉得马跃开的伤情很重，因为眉心的伤看上去不算厉

害，后来听说送宣武医院了。马跃开的后脑外伤很严重，经抢救人虽生还，但已成植物人，不能行动说话，不认识任何人了。

马跃开的母亲特别刚强，到北京看到儿子这般情况竟没掉一滴眼泪。小马受伤当天，他的十来岁小弟弟胳膊被卷进脱粒机，伤得很重，真是“祸不单行”。后来在同学们帮助下，接他小弟弟到北京，治好了胳膊的伤，但留下一点残疾。

历时十余小时的5·30大战随着老团点燃烈火、老四守军投降最终落下帷幕。

对二十多位浴室守卫者的集体投降可能有不同的评论。我赞同校友网上的评价，不管他们当时出于什么考虑，这一行动不仅挽救了自己重伤战友的生命，也拯救了两派众多参与武斗的同学，避免了更多无谓的牺牲。特别是在“活着干，死了算”、“完蛋就完蛋”的氛围下，这是一个“需要更高的智慧和更大的勇气”的、富含人性的、无疑也是最正确的决定。

在这场武斗中，团派当场死亡二人，重伤致残二人，四派死一人。这场武斗后，许多人选择了离开，校园内更冷清了。（李自茂：《毕竟东流去》）

惨烈的5·30，悲壮的5·30，疯狂的5·30！一道深深的伤痕刻在母校百年历史上，留给一代清华学子的是无言的耻辱。正如高子正同学发自肺腑的感愤：清华园，我心中挚爱的清华园啊！美丽迷人而又浪漫的水木清华啊，你是多少莘莘学子向往的神圣殿堂？！这里不光有……数不尽的光环；也有在那特殊年代，那疯狂而又荒唐的一幕幕场景。这就是历史！是人们总希望忘记，然而又无法忘却的历史……清华学子有勇气直面这段疯狂而又荒唐的历史。我们拒绝忘却；我们不断反思；我们所做的一切就是要向世人宣告——

这样的悲剧在清华园、在祖国广袤的大地上绝不能再重演了！

五、真情的承诺

1968年的5月30日，正是端午节的前一天，小时负伤住进积水潭医院接受手术治疗。家里正在包粽子准备过节，突遇晴天霹雳，悲痛至极，以至后来多年不再过端午节。同学们闻讯纷纷赶到医院，承担起陪护工作。排球队王子渝同学（物七）从海外来信说：

每每想起小时，我总是感到很难过。小时是一个厚道的人，是一个重感情、重情义的人，是一个处处与人为善而又睿智的人，所以深受同学爱戴。因为时间久远，很多事情已经记不清了，我的印象，他受伤时我在场。我参与了第一时间对他的抢救，我联系了张学琛（总部办公室主任，力05班）派车把小时送往积水潭医院。我的印象，他的主治大夫是王大夫。后来，可能是我与王杰商量安排对小时的护理。当时专案组的同学都轮流去医院看望小时，有专案全体人员和主治医生与小时在积水潭医院的照片为证。

小球队的王杰（无七）、潘沙青（化八）、李包罗（物九）、张存和，足球队的彭佑恩（自八）、赵育（力八）、杨光（电九）等许多人排班轮流护理。胡小胡也去了，他说：文革中我跟游泳队李云、丁正明他们观点一致，来往较多，与足球队好多人观点不一样。但小时受伤我就过去护理，因为是好朋友，那时要三班倒昼夜不离人。

有一群同学陪护，加之手术顺利，小时一直保持着乐观情绪。王庆章同学（精七）有一段真实生动的描述：

小时是个意志非常坚强的人，受了那么重的伤，做了那么大的手术，面对将会影响自己一生的境况，情绪上始终未露丝毫悲伤和绝望。他一方面积极配合医生进行治疗，争取尽可能好的疗效；另一方面，始终乐观地和大家无话不说，无事不谈，连医院的医护人员都觉得这帮人就像一家子似的。他不怨天不尤人，照样关心国家大事，同学之事，校园之事。当然，当夜深人静时，对所发生的事，那种无法名状的回忆，甚或后悔也曾打扰他的心绪。但小时又是非常聪明的人，从不会让类似的这种思绪干扰自己太长时间。小时和我们大家一样，特别好面儿，踢足球的都是男人，有难有痛就算天大也要像个爷们儿似的“站着活”，勇敢地乐观地千方百计地生活下去。我们的“地里排子”又启动了——尽管这次不是用腿！（《绿茵场上一甲子》）

蒯大富也多次到医院看望小时和小马，作为清华井冈山兵团一把手和北京市革委会常委，在其权力范围内尽量满足他们治疗和生活的需要。老蒯曾安慰小时，确实做过唯一先生所说“你这一生我包了”一类的保证。他还从卖井冈山报的收入中拨款给时作隆、马跃开、许恭生等每家3000元钱用于养病和生活。然而，随着7·27工军宣队进驻清华，老蒯没了权，这三笔钱又被工宣队追缴回来。蒯大富的政治生命已然终结，他自身尚且不保，大包大揽的承诺又能有什么用呢？

工宣队进校，一切又回到原来的轨道。1968年秋，七、八字班学生作为1967届毕业生开始分配工作。大家即将各奔东西了，一个严峻的问题摆在面前，小时今后怎么办？鉴于大家都有同样的思量，作为专案组负责人的王子渝率先提出一个动议：

因为涉及到小时将来的治疗及生活补助等问题，由于学校不管，小时未来的生活成了大问题，没有任何经济来源，所以我提议由我们这些代表队的同学和专案组的同学自愿参加，大家轮流给小时寄钱，尽我们所能来帮助小时生活下去。这个建议立即得到大家支持。由我和王杰排了名单，每个月有两位同学给小时寄钱，每人20元，一人一年寄一次。后来，我每次回到北京去看小时，总要问起大家寄钱的情况。我的印象，小时说实际寄钱的同学比当时确定的人多很多，而且寄的钱也比当时定的“每人一年一次，一次20元”多。（王子渝来信）

王杰还记得，当时列出了名单，还做了24个书签，写上人名和寄钱的月份，李木松则戏称其为“经互会”。因年代久远，有哪些人都说不全了，可以记起来的有：足球队的王育、彭佑恩，排球队的王子渝、张丕林（制八），小球队的王杰、王士元（水八）、李天麟（自八）、李木松、崔永芬（力八）、李达贤（水七）、陈奋光（物八），航海队的周启柔（化七），无线电队的孙毓星（孙耘，无八）、孙铮（力八），专案组的潘锦成（电八）、罗德骥（电八）、严丽文（暖八）、沈一（电八）等。当时六字班已离校，九字班以下还没有毕业，所以只排了七、八字班同学。后来，随着同学们陆续毕业，又有更多的人闻讯加入，如，王庆章，杨福缘（电八，无线电队）李包罗、张存和，朱以文（水0，乒乓球队），沈昆（汽00）等等。结果就如小时告诉我们的：实际寄钱的同学比当时确定的人多很多。其中一部分人一直坚持寄钱16年直到小时去世。

按文件规定，七、八字班的毕业时间是1968年7月，分配时已经存下几个月工资。所以还另外约定：拿到工资后，可视个人情况先给小时寄一笔钱，作为储备以备不时之需。我和孙铮都属于“待分配”（大多为机要系的政审不合格者），到12月底才一起“发配”到呼伦贝尔大草原上的海拉尔市。海拉尔属高寒地区，有20%的地区津贴，月工资为55.2元，第一笔收入，7—12月工资，就有300多元。我们决定以我俩名义给小时寄去300元。这件事传到学校竟引起一场小小的风波。迟群“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在一个会上说：一次寄300元。若不是贪污盗窃，哪来这么多钱？同学们来信相告，让我们加点

小心。小时共收到多少“储备”钱，我不知道，但可以肯定，其中每一分钱都饱含着同学情谊，都是干干净净的。

在北京积水潭医院还演绎过一场令人惋惜的爱情故事。足球队的彭佑恩护理小时耐心细致任劳任怨，被医院的护理主管小段看在眼里、记在心头，渐渐表现出爱慕之情。这可是求之不得的好事，将来在北京照顾小时不就有保证了吗？于是大家尽力撮合。忠厚老实的大彭和善良美丽的小段确定了恋爱关系。我们陪大彭小段同游颐和园，在昆明湖的冰面上曾留下二人的倩影。

可惜天公不作美。1968年底大彭分配到湖北松滋，接着，小段又调往南宁一个干修所，是专为越南高干服务的“绝密单位”。小段只能“服从革命需要”，这就意味着必须和大彭分手。一对热恋中的情侣，只好劳燕分飞。同学们的美好愿望也化为泡影。

小时的故事和大彭小段之恋触发胡小胡的创作灵感，写了一篇小说“北三行”。“北三”病房正是小时在积水潭医院的住所。不少同学都看过“北三行”手抄本（我也听小时讲过），可能算这位作家的处女作吧。

六、回家的日子

我们离校时小时还住在积水潭医院，没过多久（1969年初）就回学校了。小时弟弟还记得，胡小胡帮他骑自行车把轮椅带回清华，冒着寒风蹬车，出了一身大汗。

王子渝因专案组的问题被扣在学校暂缓分配，他回忆，小时住在2号楼的一楼东侧一屋。那时，我们还未离校的同学天天去看他，我见得比较多的有小胡，朱以文等。小胡等同学是专门负责照顾小时的，借此还可躲避“斗批改”政治学习。已离校的李木松经常问起“经互会”的情况。1969年春他从刘家峡出差到北京，还专程看望小时，一起逛了圆明园。

一个坚固的双层铁架床成为小时的新伙伴，上层安装了两个把手，靠小时的“引体向上”帮助上下床。小时一直没有放弃艰难的康复治疗 and 训练。早在积水潭住院后期就开始针灸治疗，有一位胆大敢下手的同学主动向医生学习针灸，回校后一直给小时扎针灸，后来又回到家里为他治疗。小时的姐姐还记得他。这位同学就是电机系00字班的冯家驷。

不久，工宣队就撵小时回家。为此，变换着不同面孔，先是哄、骗，承诺“我们不会不管你的”；进而又逼、压，声称“这是你自己找的事”，“你该毕业就毕业，你和学校没关系了”，用各种手段逼迫小时离开学校。王子渝回忆：我的印象，当时与学校谈判很难，其中足球队的老队员关仁卿（运动健将，水利系1955级）帮了很多忙。由于与学校谈判不成，学校也不让再住，小时就回到家里。我听说，那只双层铁床还作了价，算卖给小时家。这样，在1969年4、5月间，时作隆从一名大学生骤然变为一个“社会青年”。可以想见，这对小时是多么大的打击。

然而，新的打击接踵而来。小时的哥哥姐姐都记得，学校曾派来一个干部，四十岁左右操南方口音，自称代表工宣队，告知可以向民政局申请每月9元的补助。这位干部不讲道理，说来说去就一句话：时作隆家庭出身不好，参加武斗是一种阶级报复行为，他咎由自取。在当时的语境下，“阶级报复”这顶钢铁帽子足以把人压死。小时听到，愤懑难抑，抓起一只茶杯摔在地上，把他赶走。

小时的姐姐还说：学校逼着你们办公室姓张的同学索要那2000多块钱。快把他逼疯了，眼睛都红肿了。我们一看，赶紧把钱还了回去。我妈妈早就嘱咐过，这钱先别动，说不定还得要回去呢。……一直到唐山大地震时，（街道）还说这一个院都是地主资本家，不给我们留搭抗震棚的地方。那一阵子作隆都不愿意出屋。

可见，学校当局是带着很大的偏见、派性和报复心理处理时作隆问题的，而且带来恶劣的后遗症。相比之下，一年以后对马跃开的处理方式就好得多。

小马在1970年春00字班毕业分配时才送回老家，而且学校按照“分配留校”的特殊待遇，每月发给46元，直到他四、五年以后去世。这就缓解了他家庭生活的困难，一度使小马这位植物人恢复了些许感知能力。我们庆幸小马得到较好的对待，更对小时的遭遇愤愤不平。面对同样因武斗受伤的两位同学，学校的态度有如此巨大的差别，不禁让人唏嘘不已。

不管怎样，小时终于回到自己的家。

他家住沙滩北大红楼以北一个小四合院里。“亮果厂椅子胡同7号”是我们烂熟于心的地址，多年里牵肠挂肚的地方。

这是一个典型的传统中国式家庭，一家子善良安分，不招人不惹事，待人有礼，说话和气，邻里间互帮互助友好相处。

小时的大哥大姐已在北京成家，二哥二嫂同在甘肃地质队工作，一个弟弟到山西插队，家里只剩下老父老母。小时的母亲虽然大字不识一箩筐，却“胆大心细，遇事不慌”，处事既稳妥又果断，是一家之主。比如，拿到老蒯批给的钱以后，她就叮嘱女儿：这钱你收好，说不定哪天就得要回去。老人家阅历丰富，确有先见之明。

可以想见，照顾小时的重任，主要落到年过半百的老两口身上。小时的生活要遵循严格的规范和程序，比如按摩、服药、挤尿、大便、上床、下床、翻身等等。下班后儿子和女儿都过来帮忙，但半夜里定时挤尿、翻身、换尿垫只能靠两位老人了。冬季小平房里只生个煤球炉子，夜间再冷也得穿衣起床，干完活再睡。这样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真难为了两位老人。老人的榜样在前，一家人齐心协力不计多寡，任劳任怨共度时艰。同学们都感叹：多亏是这一家子，否则小时能活多久还真难说了。

天道不公，人道坎坷，灾难再次降临这个家庭。从事地质工作的二嫂在唐山大地震中殉职，她的两个儿子雨、鹏只好留在爷爷奶奶身边。小时深知一家人的艰辛，就想方设法做些力所能及的活计。有时，他要抱着幼侄小鹏，让老母亲腾出手去做饭；有时他把脸盆放在身边，为洗小侄的尿布和衣服。小时还有一件专用工具——带铁丝钩的木棍，小鹏如果跑远，可以钩住衣服拽回来。

从此，小时就承担起照看、教育小侄的重任，像一个尽职的父亲一样。小雨小鹏在他们的三叔面前长大成人，如今一个在北京，一个在美国，都学有所成，生活幸福。

小时啊！你的心血没白费，你的在天之灵该得到许多安慰吧。

七、情同手足

小时所承受的生活上和政治上的压力是我们常人无法想象的。他大半个身躯失去知觉，惟有臂力很足。他头脑清晰，博览群书，包括流行在知青中的“手抄本”，不断充实自己，思想益发深邃。他购买了一台短波半导体收音机，收听 BBC 和美国之音，以便更快捷地了解天下大事。他身居陋室心怀天下，更加关心时政，忧国忧民。他精神坚韧，以自己的聪慧将压力缓解、释放，还鼓励大家跨越生活道路上的沟沟坎坎。

我和小时真正的思想交流是在毕业以后。我们时常在信中畅谈：谈天下大事，谈所见所闻所思所想，交流同学们的近况和轶事。我和许多同学一样，不论出差、探亲，只要到北京必然先去小时那里“报到”。他住的小耳房成了繁忙热闹之所。小时那里汇集了各种大道小道消息和天南海北同学的许多故事。我听到青海“西宁帮”摆阔请客和浪漫爱情的故事；听到吉林浑江水电站一百单八将“革命化”的爱情等各种轶事；听到安徽丹阳湖农场大战“出血热”，依靠“狗拿耗子”的奇闻；我也听到在广东牛田洋海啸中无知和僵化带来的巨大灾难。……这样的“臭聊”中，时间不知不觉地过去。中午时分，时伯母会笑咪咪地端上一大碗捞面，配上黄瓜丝、芝麻酱或花椒酱油，吃起来别有风味。时至今日，花椒酱油面仍是我们餐桌上的一款简单独特的保留美食。

1970年春节，我和孙铮回北京探亲，特意到小时家显摆，要做一款东北风味菜——拔丝土豆。在他家屋门口的煤球炉上，我摆好架势，先炸土豆块，后加油熬糖，待火候一到，放进土豆，随即将炒勺一颠，只见土豆留在锅里，而糖全进了火炉子。拔丝土豆没吃成，倒增添了一份笑料。

1971年春节刚过，我就被几个军人（军宣队和工农兵学员）押解回北京，作为5.16分子关在清华主楼，开始了长达2年零3个多月的审查，直到1973年5月被送回原单位。我孤身在清华，一有机会就溜到小时家，因为那里是我精神的寄托、心灵的港湾。1979年我再次陷牢狱之灾，孙铮回京探亲，不敢向母亲透露我的情况，也只能到小时处倾诉。

1971年夏天，我从东主楼八区的临时监牢放出来，获得部分的自由。我马上来到小时家。他早已听说学校的情况和我的遭遇。当我说起团派的老工人韩启明、捉鬼队的陈贯良和物0一位同学（尚不知他叫栗乃志）自杀身亡时，小时面色凝重起来，他缓缓地说：你知道我们队的牯牛为什么自杀吗？我默然。我与牯牛并不熟悉。

牯牛即王崇基，动农系汽八学生，在足球队司职左后卫，曾与小时、小胡同住一室。在一张1967年拍摄于二校门的照片中，他们蹲在主席像前，中间面带微笑的就是牯牛，他的右边是小胡，站立者右二是小时。

牯牛重感情讲义气，有些多愁善感，平时喜欢读书，涉猎广泛。1964年“九评学习”时鼓励学生暴露思想，牯牛检讨了自己读《圣经》的事。事后他又背上沉重的思想包袱，经常失眠，后来又患上肝炎，休学一年，留级到汽九。

1968年底王崇基分配到河北邢台拖拉机厂。人们看到，这个清华来的高材生“大王”聪明能干、尊师爱友、谦逊好学，特别有一身好球技，带领厂足球队过关斩将取得好成绩，一时声名远扬。

牯牛成为厂里小青工的偶像。他们常常围在大王身边听他讲各式各样的故事。1970年3月，河北邢台的“清队”、“一打三反”和“清查5.16”几场运动接踵而来。有人告发：王崇基常纠集一群崇拜者讲“红与黑”、“奥赛罗”、“茶花女”，讲巴尔扎克、大

仲马等等，是一个“裴多斐俱乐部”。接着就是一连串的批判斗争，发展到高潮竟然给他戴高帽挂胸牌游街！这是多么大的耻辱！巨大的落差使沉浸在自我世界里的牯牛无法接受。他越来越想不开。一天下午，他回到自己的小屋，用电灯线捆绑住两手，把拉线一拽——一个活生生的牯牛就此魂飞天外，与他的家人朋友，与这个“悲惨世界”永别了。

可惜啊。我总想，如果牯牛能与小时多些思想交流，哪怕写上几封信，悲剧就不至于发生了。

1971年9月中旬以后，我感到气氛有些异样，专案组多次谈话，不是问“罪行”，而是关心我的“思想动态”。于是我又溜到小时家。一见面他就说：“你知道吗？出大事了——林彪跑了，摔死了。”我惊愕不已。太不可思议了。我的头脑中犹如爆炸了一颗政治原子弹，又好像一桶冰水浇头，通身凉透却使我骤然清醒。我不得不重新思考关于文革的方方面面，重新认识社会与政治。总之，这是我思想解放的开端。（孙耘：《直面良知：我的文革心路历程》）

与我的惊愕不同，小时却语调平和，面带微笑地谈及林彪出逃事件。因为他早已有了深邃的思考和自己的见解，即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灾难，必然会失败。

与像我一样的许多团派的同学相比，小时是思想解放的先行者。他觉悟得早，对政治、历史，对文化大革命的认识都高我们一筹。他的预见也常常为现实所证明。我们许多人都从他那里汲取营养，充实思想，丰富人生，这是至今对他难以忘怀的重要原因。

以后多年，我们的境遇多变，喜怒哀乐忧五味俱全，其间一直与小时保持密切联系。我们的遭际通过小时传给山南海北的同学，他们的状况和关切也通过小时送到我们耳际。特殊的境遇使我们和小时成为情同手足无话不谈的朋友。小时以自己的坚韧、睿智、达观激励我们不断战胜自己，以积极的心态面对生活的挫折。可以说，与小时的交往是我一生最值得庆幸的事情之一。

八、逝者长已矣，生者如斯夫

时光在艰难中流逝。年事已高的父母越来越难照护高位截瘫的小时。他不得不增加躺在床上的时间，这样又造成排尿不净，久而久之影响到肾脏，最终发展为尿毒症。如今尿毒症可通过透析解决，但在30多年前，据说只有朱德一类人物才能用上透析。

小时住进医院。家人轮班护理，大约一个月之中，在京的同学彭佑恩、王子渝、方纯正（热六，排球队）、李包罗等时常去看望、帮忙。大彭告诉我，小时肾脏衰竭，但心脏十分强健，所以更为痛苦。王子渝回忆：我最后一次去人民医院看他时，因为毒素侵入大脑，他说话已经很困难，但头脑仍很清楚，我们长谈了很久……

1984年9月28日，在进入人生第40个年头不久，小时终于彻底摆脱了痛苦，离开了这个不值得留恋的世界。算下来，他已经与伤残顽强抗争了16年零4个月。王子渝、大彭陪同他的亲人送小时到八宝山，代表我们大家向他行最后的鞠躬礼。

我的内心充满悲伤和遗憾，如同王子渝的感慨：如果我们的条件好一些，如果我们有能力提供更多的帮助使小时能够获得更好的护理，就小时的体魄应该能够活得更长久……

小时留有遗愿，想为父母买一台彩电和洗衣机。当时彩电属稀缺的高档消费品，价格相当于普通人2年的工资，还要凭票供应。在北京的方纯正、王子瑜、彭佑恩、李包罗等人商议，让每人再出100元，买一台彩电送给时家伯父伯母，算最后一次代小时尽孝。大彭来信通报小时去世并告知这一决定。我们的款还没寄出，又一封信追过来，说钱已凑足，不必再寄了。

方纯正想方设法弄到一张二商局长的批条，与李包罗一起到虹桥市场买了一台14吋彩电（价值1400元），送到小时家。时伯母看到，流下了眼泪。

小时本应留下很多资料，如诗文、书信、账目、照片等等，但被时伯母一把火连同他的遗物一起烧掉了。我完全理解这位老妈妈。这些徒增悲伤，还会惹事生非的东西留它做什么？！

小时是有心人，曾留下一盘录音磁带，里边一定有他想对大家说的话。出于可以理解的原因，家人只保存着而没有去听。可惜的是，几经周折，这盘磁带已经找不到了。

逝者长已矣，生者如斯夫。生活依然在继续。

1996年，我和孙铮先后回到北京。1997年，当年常在小时周围的一些代表队同学又开始聚集，队伍不断扩大，成为一个快乐生活小团体，自称每周Club。多年来，这个小团体作为骨干，为原体育代表队的校友活动承担了许多联络、组织工作。

大家时常念起小时，也惦记着二老和两个小侄。2001年我们十几家同学去看望小时一家。二老都年逾八十，依然红光满面，只是时伯父有点老年痴呆行动不便。

2006年为给唯一回信欲再次与他们相聚时，二老已先后谢世。

这就是历时半个世纪的时作隆的故事。

就在本文行将收尾时，我收到李建国同学一个电话。他说，一个月前见到一位校友，也是马跃开的老乡，得知小马的母亲身体不很好，生活有困难，遂与张冠忠发起，联络到力004班17位同学，包括海内海外、老团老四，很快集资一万元，将南下会同张冠忠一起去马跃开家探望。

几天后，张冠忠发电子邮件汇报情况：

建国6月29日下午到无锡，在家住一晚。第二天30日一早建国和我及夫人孙玲6：00开车出发。一路向北，下高速后几经辗转，11：00到达江苏盐城地区芦蒲镇马集村。正在打听，见马跃开弟弟马朝开及其媳妇前来接，跟随二人去跃开家……跃开老母亲正坐在桌旁旧木椅上张手迎接我们。老母亲古铜色的脸庞，精神矍铄，紧握我的手，有力，抚摸我的手时，感到微微颤抖，眼睛里仍然没有丝毫的泪水，与几十年前到清华见到病床上植物人的儿子时一样。她还记得我的名字，叫我张冠忠。我也强忍泪水，和建国一起奉上大家的捐款，建国说代表全班老同学问候您。老母亲今年96岁（虚岁），耳不聋眼不花，前年摔了一跤，胯骨粉碎性骨折，没有住院，中医贴膏药就好了，现杵着双拐，可自己走路。……

（回程中）一路感慨，马跃开母亲真是中国劳动妇女的典型代表，心胸豁达、忍辱负重、勤劳善良朴实、超强的生命力和忍耐力。

衷心的感谢004班的老同学们，替马跃开敬了一份微薄的孝心。

我钦佩力004同学，因为在他们身上展现了清华学子的优良品德，就是先贤所倡导的：忠、孝、仁、义、礼、智、信。

我感谢力004同学，因为他们跨越半个世纪，续写了马跃开的故事，成为时作隆故事的姐妹篇。

这就是我们的故事，一代清华人的往事真情。

附言：感谢以各种形式提供资料的同学和朋友，恕不一一罗列姓名。文中如有遗漏、谬误之处，盖由作者负责，并敬请批评指正。

作者简介 孙耘，本名孙毓星，天津人，1945年生。1962年考入清华无线电系；1980年到哈工大读研究生。先后在内蒙古、黑龙江、北京工作，担任过工人、工程师、教师、职业经理人等。现已退休，常居北京。

□ 原载《历史拒绝遗忘——清华十年文革回忆反思集》，中国文化传播出版社，2015年

~~~~~

#### 【微观历史】

是红卫兵打死了卞仲耘吗？  
——兼谈宋彬彬的道歉（1）

• 陈闯创 •

〔摘要：1966年8月5日打死北师大女附中副校长卞仲耘的既有该校学生也有外校学生，现有资料表明凶手里的女附中学生当时并不是红卫兵，但尚不清楚是否有外校红卫兵参与行凶。原女附中学生领袖宋彬彬承担了不应有的巨大历史罪名，但她要澄清自己、摆脱耻辱的唯一办法就是直面并批评中共的“蒙昧主义和暴力镇压”本质，否则她也只能作为中共的牺牲品被历史记住。〕

1966年8月5日下午，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以下简称“女附中”）高一3班部分学生（以中共干部子女为主）批判殴打该校5位领导，校内外的其他学生也陆续参与进来。在被侮辱殴打折磨数小时后，该校中共党总支书记兼副校长卞仲耘遇难，被后人称为北京“八五”事件。在文革中死于学生之手的教育界总人数至今无法统计，卞仲耘既不是第一个，也不是最后一个。对于当时的中国人来说，政治贱民在政治运动中被打死或自杀的事件司空见惯，也很少有人会因此承担责任。22年后的1988年，女附中原高一3班学生王友琴作为八五事件亲历者首次披露了这件事（2）。在随后的调查中，王友琴提供了很多卞仲耘遇难案的细节，但其中并不包括她那些作为该案肇始者的同班同学的名字，她的校友宋彬彬（女附中原高三3班学生）却成为她对此案记录的中心人物：王指控是红卫兵打死了卞仲耘，而宋彬彬是该校红卫兵领袖，并且宋因为在1966年8月18日给毛泽东带上“红卫兵”袖章以及被毛泽东赐名“要武”而成为红卫兵最知名的代表（3）。

刘进等多位女附中校友在2002年后开始合作调查“八五”事件，宋彬彬后来也加入其中，调查结果于2010年4月首度部分公开〔4〕。2012年1月宋彬彬发表文章具体谈到自己与“八五”事件的关系，并在文中向卞仲耘的丈夫王晶珪道歉〔5〕，2014年1月12日宋和刘进等人回到母校就自己在文革中的作为道歉〔6〕。刘进、宋彬彬的调查结果和道歉虽然有助于人们进一步了解“八五”事件，但她们始终回避“八五”事件真凶的问题。王晶珪在2014年1月27日签署声明，表示在真相大白前绝不接受宋彬彬、刘进的虚伪道歉。宋彬彬在2012年还发表《王友琴加于我的历史耻辱架》，这实在是夸大了王友琴的作用，真正把宋钉在耻辱架上的是靠暴力和欺骗发动文革并持续掩盖真相的毛泽东和中共。

卞仲耘遇难事件的真相至今未得到完全公开，争议的焦点主要汇集到以下五个问题：1.事件的策划人和发起者是谁？2.打人者是谁？3.卞何时遇难以及是否有人抢救卞仲耘？4.女附中当时的掌权者是谁以及有多大的权威，在此案中应承担多少责任？5.女附中的红卫兵在此案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

对于前4个问题，笔者没有答案，期盼当事人或研究者能提供和发掘更详细的资料。但第5个即关于红卫兵的问题，笔者认为现有资料已经提供了明确的答案，只是很多人还不愿意接受：截至卞仲耘遇难时，北师大女附中还未成立以“红卫兵”命名的组织，即8月5日打死卞仲耘的女附中学生当时还不是红卫兵（按：下文中凡是提到的日期如未标明年份，即默认为1966年）。

考虑到关于红卫兵运动初期情况的说法谬种流传，笔者将先澄清红卫兵运动初期的若干重要问题，然后再具体谈及北师大女附中的情况，最后讨论一下宋彬彬的道歉的问题。

## 一、红卫兵运动的兴起

首先需要说明的是，笔者完全赞同去追究在卞仲耘遇难事件及类似暴力事件中凶手及相关人物的责任，但责任大小应取决于其涉案程度，而与其个人身份无关，不管是共产党员、红卫兵还是一般群众。也就是说，没有行凶的红卫兵就不应该承担行凶的责任，而行凶的即便不是红卫兵也应为此担责。正如印红标所说“不论是群众自发的暴行，还是红卫兵成员的暴行都应当谴责。”“在叙事的时候应当尽量准确，不必让红卫兵为所有的暴行负责，例如令人发指的北京大兴县农村的灭门暴行，就不是学校红卫兵所为。”〔7〕

从现有材料看，制造北京“八五”事件的师大女附中凶手们当时还不是红卫兵，承认这一点并没有减轻甚至有可能增加她们的罪恶程度：这种无需组织即可随意实施的暴力比有组织暴力更加难以预测，而施暴者不会为此受罚甚至还会被奖赏就使得这种暴力更具有威慑性。另外，红卫兵犯下的暴行数不胜数，承认北京“八五”事件不是红卫兵实施的也绝不会减轻红卫兵的罪恶。在1966年8月下旬开始的北京红卫兵“破四旧”的活动中，十天内至少有上千人被红卫兵活活打死了，单此一件事就足以将红卫兵（尤其是老红卫兵们）永远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8〕；其次，有理由相信，在8月7日女附中成立红卫兵时，那些两天前殴打卞仲耘致死的女附中学生（尤其是干部子女）基本都会加入进来，而绝不会因此被拒绝加入（见下文）。

笔者在《略谈文革初期没有“红卫兵运动”和“造反派”》一文中说1966年8月前中国并没有红卫兵运动，当时仅在北京十几到几十所学校（几乎全是高中）里存在着名叫“红卫兵”的学生团体，另外还有极少数学校里有“红旗”、“东风”等类似的团体

〔9〕。将这些团体统称为“红卫兵”组织是不恰当的，他们彼此之间既无联系，而且北大附中“红旗”战斗小组在相当一段时间内和清华附中“红卫兵”并驾齐驱甚至名头更响亮，而“红卫兵”不过是众多自发学生团体中的一个而已。

这些小团体一般以高干子女为主，人数很少，虽然在6月份有过一些激进的活动，但到7月下旬时几乎就要被一贯压制独立团体的中共所镇压或融化掉了。中共中央政治局7月13日开会讨论北京中学文化革命时就说“搞秘密团体都不要，地下活动是错误的。”〔10〕？众所周知，直到得到毛泽东8月1日和8月18日两次的大力支持和扶植后，红卫兵运动才先后于北京和全国范围内兴起，但有若干细节尚未引起人们广泛注意。

1.1966年7月下旬，回到北京不久的毛泽东对文化大革命的现状非常不满，并将此归罪于派到各单位主持运动的工作组“镇压群众运动”。虽然工作组是刘少奇等中共官僚按照以往政治运动惯例而派出的，毛泽东仍要求撤销工作组。因此，原本即将被工作组压垮的北大附中红旗和清华附中红卫兵分别在7月25日和7月27日得到了转机，到7月29日北京市大中学校文化革命积极分子大会宣布撤销工作组时，红旗和红卫兵之前所承受的来自工作组的压力就完全消失了，各自的革命左派地位进一步得到了认定。在这个过程中北大附中红旗及其代表彭小蒙多次在公开场合亮相批评工作组，名气大增。

2.清华附中红卫兵和北大附中红旗最早直接来自毛泽东的支持是毛泽东致清华附中红卫兵的信，毛于7月31日写出此信并批给下属阅读，但最终并未发出。8月1日毛将该信作为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文件印发，8月2日信件即从参加会议的北京军区司令杨勇处传出并为清华附中红卫兵头目宋柏林得悉〔11〕。8月3日清华附中红卫兵代表王铭、卜大华从中央文革副组长王任重那里看到信，8月18日清华附中红卫兵骆小海等人在天安门城楼上向毛问起此信，毛说只是草稿还没发呢。不过这封信仍然通过高干子女等渠道快速传播开来，在北京迅速出现各种仿效“红卫兵”和“红旗战斗小组”的所谓自发组织，但截至8月18日在北京以外只有极少数大城市零星出现了由消息灵通的高干子女成立的红卫兵组织。

3.北大附中红旗和彭小蒙的突出地位。正因为红卫兵后来的巨大名声，反而很少有人注意到北大附中“红旗”战斗小组及其代表人物彭小蒙在1966年7月下旬到8月18日之间其实是比清华附中“红卫兵”更早、更多得到官方支持以及名声更大。宋柏林就在7月27日的日记中提到“看来彭小蒙尾巴翘太高了，把各校左派的兄弟关系看成老子、小子关系”。

因为反工作组受到中央文革小组支持，北大附中“红旗”的彭小蒙在7月下旬连续抛头露面，7月25日、26日连续两晚中央文革在北大召开群众大会，彭小蒙上台发言批判北大工作组及组长张承先，7月27日海淀区中学文化革命工作队在北京展览馆召开革命师生代表大会，彭小蒙发言介绍江青在北大讲话内容，7.28在北京展览馆开会批判工作组，彭小蒙仍然上台发言，而直到这次会议清华附中“红卫兵”两篇论《革命的造反精神万岁》的大字报才得以交给江青并转给毛泽东。8月1日毛泽东在给清华附中“红卫兵”的支持信中却同时点名支持了北大附中“红旗”战斗小组和彭小蒙，这就足以说明“红旗”通过江青已经给毛泽东留下了深刻的印象。8月4日彭小蒙在北大全校大会上殴打张承先〔12〕。

8月11日《人民日报》转载了8月10日发表在《中国青年报》的文章《有了毛泽东思想就无往而不胜》，署名为北京大学附中“红旗”战斗小组彭小蒙。8月18日彭小蒙代表中学生在“首都庆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群众大会”（即毛泽东接见群众大会）上讲话。而清华附中的红卫兵直到8月19日才出现在《人民日报》的报道《毛主席同红卫兵在天安



门上》，正是这篇报道才一举奠定了红卫兵一统江湖的地位，文中提到毛泽东戴上“红卫兵”的袖章，并引用康生的话说“毛主席也参加红卫兵了”。不过这篇报道同时还赞扬北大附中“红旗”战斗小组是“以敢于冲锋陷阵闻名的战斗组织”。

另外，文革中最早出现最为知名的群众歌曲《革命造反歌》就是北大附中“红旗”在6月初创作、7月1日定稿的，歌词中的“革命师生齐造反”使这首歌成为目前能够查到的最早鼓吹造反的两篇文献之一（13）（另外一篇就是1966年6月24日清华附中“红卫兵”的《革命的造反精神万岁》大字报）。事实上，正是因为北大附中“红旗”战斗小组的巨大名气，后来大名鼎鼎的北航“红旗战斗队”于8月20日成立时都是仿效北大附中“红旗”战斗小组取名的（14）。

4.毛泽东8月1日的信为清华附中“红卫兵”和北大附中“红旗”提供了巨大的支持，但尚无证据表明在8月18日前毛及中央文革小组就已决心支持推广“红卫兵”或“红旗”的组织形式。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于8月8日通过了由毛泽东多次修改的《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通称“十六条”），这一文革纲领性文件中只是抽象地赞扬“一大批本来不出名的革命青少年成了勇敢的闯将”，没有提到“红卫兵”或“红旗”，却说“文化革命小组、文化革命委员会和文化革命代表大会是群众在共产党领导下自己教育自己的最好的新组织形式”。王年一在这次会议上没有任何肯定红卫兵的表示，参会的上海市长曹荻秋甚至在8月18日大会过后仍然反对上海建立除“文化革命委员会（小组）”以外的组织，比如红卫兵，曹说“我们只搞文化革命的组织，组织红卫兵的问题还要考虑，我们不提倡，（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上没有讲”（15）。

5.毛泽东8月1日致清华附中“红卫兵”的信流传开后，北京出现了众多自发学生组织，开始并没有任何迹象表明红卫兵将成为这些组织的统一名称，他们当时还只是习惯性的统称自己是左派。甚至在8月18日大会后当晚，有学生向周恩来提问中央能否就统一组织做出具体办法时，周还提议把红卫兵、红旗、赤卫队等组织统称为赤卫队比较好（16）。需要说明的是，1966年8月18日大会并不是“毛主席首次接见百万红卫兵大会”，到场红卫兵仅有几万人而已。红卫兵在八一大会上登上政治舞台，毛泽东在会上戴上了宋彬彬送上的“红卫兵”袖章，会后中共舆论机关极力宣扬，红卫兵的名称才得以席卷天下。

实际上8月18日以后各单位出现的首批红卫兵组织往往是由地方当局顺势授意或包办建立的，以应对、引领蓬勃兴起的群众运动。这批8、9月期间成立的官办红卫兵一般是保守派，和稍后10月份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期间兴起的造反派红卫兵是有明显区别的。比较常见的是，官办的红卫兵直接以“××单位红卫兵”命名（也就是所谓的“三字兵”，因为只有“红卫兵”这三个字），造反派红卫兵为突出与官办红卫兵区别往往以“××单位毛泽东主义（思想）红卫兵”命名（也就是所谓的“思想兵”或“主义兵”）。比如清华大学8月20日出现的第一个“清华大学红卫兵”就是由原工作组扶植的贺鹏飞为首成立的，8月22日出现的“清华大学毛泽东思想红卫兵”就是由主张批判工作组的学生发起成立的（17）。当然文革期间各地形势千差万别，总有例外，比如广州市官方最早扶植的红卫兵就叫“毛泽东主义红卫兵”，重庆官方先建立了“中学生红卫兵总部”，又组建“大中学校毛泽东主义红卫兵总部”，不久又将两个总部合并称“毛泽东思想红卫兵”（18）。

6.毫无疑问，毛泽东既是红卫兵运动的发起人，也是其终结者。值得注意的是，在北大附中“红旗”和清华附中“红卫兵”自发成立近两个月后，毛泽东才通过江青发现了“红卫兵”和“红旗”；并且显然是出于推动文革的政治算计，毛泽东表示热烈的支持他们的造反

精神和行为，从而形成了“红卫兵运动”。这个时间差足以说明毛泽东不是算无遗策在筹划文革伊始就决意借用青少年学生作为推动文革的主要力量，支持红卫兵和批准大串联等等都只不过是毛面对局势自然发展时做出的应对策略，至于其结果自然是毛也无法完全预计和控制的。1966年10月下旬，毛泽东就说“我也没有料到，（北大）一张大字报一广播，就全国轰动了。给红卫兵这封信，我还没有发出，全国就搞起红卫兵来了。各种各派的红卫兵都有。”（19）

## 二、北京师大女附中：卞仲耘之死与红卫兵

现有材料说明北师大女附中在？1966年8月5日卞仲耘被打死时尚无以“红卫兵”命名的组织？，只有一个叫“红旗”的少数派激进团体，而发起批斗卞仲耘的学生所持观点是和“红旗”对立的。直到8月7日，女附中才成立了“红卫兵”。

李红云在《师大女附中红卫兵是何时成立的——从一份原始记录说起》说：文革期间，女附中曾出现过两个红卫兵组织，即“红旗”（毛泽东主义红卫兵）和“红卫兵”。“红旗”正式宣布成立于1966年7月31日，由反工作组的部分学生组成。“红卫兵”成立于1966年8月7日（20）。

李红云的文献来源分别是北师大女附中“文化大革命筹备委员会”会议的原始记录（简称“记录”）和《师大女附中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两条路线斗争大事记（1966.6.1—10.3）》（简称“大事记”）大字报手抄件，笔者认为她的考证结论是正确的，但不同意她把最早期的“红旗”也称作红卫兵组织。“记录”中清楚记载了8月7日成立红卫兵，无可辩驳。考证的难点在于如何理解“大事记”中的如下记载：7月31日，校内成立了“红旗”（毛泽东主义红卫兵）“红卫兵”。这句话能否说明女附中学生在7月31日同时成立了“红旗”和“红卫兵”两个团体，或者说“红旗”就是“红卫兵”？

根据女附中文革的展开情况，结合本文第一节所述红卫兵运动的北京，笔者认为女附中“红旗”和“红卫兵”在成立之初是两个观点不同甚至相反的组织。激进的少数原反工作组派率先成立了“红旗”，而原支持工作组的保守派作为成立“红卫兵”在后，“红旗”后来既为顺应形势又为显示独立性被动改名为“毛泽东主义红卫兵”。具体情况如下。

驻北师大女附中工作组于7月30日撤出该校并宣布“让学生自己解放自己，自己起来革命”，反工作组的学生梁二同等人次日即7月31日就宣布成立“红旗”。此前梁二同等人因反工作组在校内受到打压，就很少在校内活动，主要是在校外串联，她们已经同海淀区的清华附中“红卫兵”建立联系（21），但在7月31日她们选择以“红旗”而非“红卫兵”为自己的组织命名，这很可能是因为当时受到中央文革小组大力支持的北大附中“红旗”战斗小组风头正盛远超清华附中“红卫兵”，而不代表梁二同等人不认同清华附中“红卫兵”的造反精神。

8月7日原工作组扶植的“学生代表会”和“革委会”负责人刘进、宋彬彬决定成立“红卫兵”，这并不能说明她们接受清华附中“红卫兵”所主张的造反精神，而很可能只是她们作为高干子女已经得知毛泽东6天表示的对清华附中“红卫兵”和北大附中“红旗”的大力支持，既然反工作组的学生已经成立“红旗”，她们自然只好选用“红卫兵”为自己的团体冠名。在卞仲耘遇难两天后她们就以学校掌权者的身份决定成立“红卫兵”，并且准备接受所有愿意加入进来的红五类，这就说明她们一方面是想稳定工作组撤离后出现的乱局，另一方面对于打死卞仲耘的红五类则毫无排斥。她们甚至还想吸纳作为对立面的“红旗”加入到“红卫兵”来，但事后的发展表明女附中“红旗”拒绝被“红卫兵”所吸纳（22）。

到了8月18日毛泽东接受女附中“红卫兵”头头宋彬彬戴上红卫兵袖章，大势所趋之下，保持少数派的女附中“红旗”只好改名，但像很多组织一样，为显示同官办红卫兵的区别，表明更加激进的姿态，她们改名为“毛泽东主义红卫兵”。

需要补充的是，虽然多名女附中校友陶洛诵、邓榕、张敏、冯敬兰、刘进曾说过1966年7月份时女附中就出现了红卫兵，这不足以否定李红云的考证。原因很简单，李红云是依据原始文献进行的考证，而人们在回忆很久以前的事情时往往发生时间错位。比如金大陆曾考证文革期间上海有无肉票，30个人仅1人正确的回忆没有，这还是十年范围内的误差（23），而关于红卫兵成立的回忆时间误差仅是几天，就更有理由怀疑这些人的回忆精准度。更何况，笔者在《略谈文革初期没有“红卫兵运动”和“造反派”》说过，受中共故意误导和掩盖真相所致，绝大多数人早已习惯性的在谈论红卫兵、造反派时犯下时空错位的错误。就像南京八三事件中江苏教育厅长吴天石和南京师范学院中共党委副书记李敬仪夫妇在学生批斗中死亡一事，南师校史竟然记录称是红卫兵打死吴、李夫妇，这纯属无知，当时南师根本不可能有红卫兵，卜伟华就对此记载提出批评，这种时空错位实在是太多了（24）。

考证了8月5日女附中只有“红旗”而尚无“红卫兵”组织后，需要进一步了解“红旗”在卞仲耘遇难一事上承担何种角色。“红旗”是反工作组的高三学生成立的，而无论是王友琴1988年的文章还是2010年刘进等人公开的调查结果，都指认是高一3班部分学生在工作组撤离后为摆脱原来因支持工作组而陷入的困境，要显示自己的革命精神而发起揪斗“黑帮”的（即已被公开批判的校领导卞仲耘等人），打人的主要就是高一和初二的学生。而反工作组的高三学生事发时曾劝说斗黑帮不要体罚打人，事发后第二天则调查事情经过（25）。这足以说明持反工作组立场的少数派学生组织“红旗”与卞仲耘遇难事件无关。事实上，五十年过去了，至今没有任何人指责过女附中“红旗”应为卞仲耘遇难负责（26）。

当然，殴打卞仲耘的学生中还有少数毕业于女附中初中后就读于其他高中的学生，比如迄今为止唯一被披露姓名的凶手刘南南，没有任何资料表明她在打人时是否具有红卫兵的身份。所以，现在还不能就红卫兵是否打死了卞仲耘做最终结论，但可以断言对卞仲耘行凶的女附中学生当时并不是红卫兵，她们是以群众的身份为满足个人的政治私欲而公开实行了一次私刑。比起红卫兵的有组织暴力，这种非组织的群众暴力的恐怖性并没有逊色多少，甚至更可怕。

那么为何，在过去几十年尤其是李红云文章发表两年来，绝大多数人仍然习惯性的把北京八五事件的责任归到红卫兵身上呢？

首先，当然是中共压制对文革的研究，共产党首领邓小平对历史问题“以粗不宜细”的限制，以及为避免对文革罪魁毛泽东的否定，引导人们简单化地把一切罪恶都归到“红卫兵”和“造反派”身上。只是因为八五事件引起如此大的争议，才有人会为此专门寻找史料，时隔40余年才重见天日。另外，红卫兵在8.18后给人的印象太深，完全压过了北大附中“红旗”的风头，人们不知道此前实际是彭小蒙代表的北大附中“红旗”更有名，不容易相信北师大女附中是先成立了名为“红旗”的组织，而后才出现了名为“红卫兵”的组织，而这两个组织在女附中实际上是观点对立的。

其次，北京八五事件与三周后红卫兵实施的“红八月”恐怖时间上很近，使得人们易于产生两者相关的联系。实际上北京八五事件并非仅有的一起学生打老师事件，在其之前和之后多个地方均有发生，其主要原因和工作组而非红卫兵有关。工作组撤离学校前后，原来支

持工作组的学生（一般称为“保守派”，当然也有特例）为体现自身的“革命”，摆脱了工作组原来施加的限制所谓“乱斗”，自行揪斗早已被抛出的批判对象。在多个地方都发生了此类事件，并有人伤亡，比如南京师范学院八三事件及其他南京高校的类似行为，北京四中八月四日学生大规模斗老师，江西师大八月十一日原支持工作组一派批斗黑帮导致三人死亡一人自杀，上海多所高校八月初“斗鬼风”等等。限于篇幅限制，笔者将另文专论文革初期的工作组与暴力问题。

### 三、宋彬彬的道歉

在读到宋彬彬和刘进2014年1月12日的道歉时，我就感觉她们两人的悔改之心是真诚的，但我怀疑卞仲耘的丈夫王晶垚先生不会接受她们的道歉。果不其然，王晶垚不久就发表声明，称：在“八五事件”真相大白于天下之前，我决不接受师大女附中红卫兵的虚伪道歉！（27）王晶垚知道宋彬彬没有参与殴打卞仲耘，他所要求的真相至少应包括卞仲耘案凶手的姓名。很遗憾，虽然刘进牵头、宋彬彬参与的为期8年的调查已经得到了众多行凶者的姓名信息，但正如王冀豫评论的那样，“女附中最大的失败，就是居然没有一个人说出打死校长的那些人是谁。”（28）

宋彬彬曾为女附中第一张大字报道歉，这是她个人选择，但道歉理由有些牵强。首先从当时中国宪法第87条所规定的言论自由角度来说，她作为学生写大字报批评学校领导的治校方针并无不可。更何况刘进和宋彬彬之所以在6月2日发表大字报，完全是为了响应中共舆论机关（奉毛泽东的命令）播发北大聂元梓等人批判北大校长等人的大字报，以当时形势而言，没有宋彬彬这张大字报，也肯定会有别人迅速相应贴出大字报。所以宋彬彬说因为她们的大字报而破坏了学校正常秩序，实在是言过其实，承担了不该由她承担的责任。

宋彬彬要不要为组建女附中红卫兵道歉？如果从宪法87条所规定的结社自由的角度来说，她当然有权成立各种组织。关键是成立组织后她们做了什么事情。另外，如果红卫兵确实是一个自发群众团体，那么她们限定“红五类”才能加入也无不可。但问题是当时其他所谓家庭出身不好的学生无权成立什么“黑卫兵”、“灰卫兵”之类的组织，也就说所谓结社自由显然是虚假的。她若为自己当年盲从上级、没有辨别是非和独立思考的能力而道歉是可以的，但还应追究为何丧失这种能力。

那么宋彬彬应该如何道歉呢？1966年8月间所发生的卞仲耘之死、毛泽东令其“要武”、北京红卫兵十数天内活活打死上千人（即所谓“红八月”）这三件事，令宋彬彬被钉在历史耻辱柱上。这三件事都与中共煽动、放纵、利用暴力有紧密关系。更由于中共一贯扭曲、掩盖文革事实，人们迄今不明这些暴力事件的真相，宋彬彬也就无法彻底澄清自己、摆脱耻辱。对宋彬彬来说，仅有真诚的悔改态度是不够的，除非她能像斯大林的女儿斯维特兰娜那样独立思考和批评父辈所作所为（29），直接批评共产党的“蒙昧主义和暴力镇压”本质，否则那她就不可能真正从历史耻辱架上走下来，而只能作为中共的牺牲品被历史记住。

据宋彬彬在《四十多年来我一直想说的话》，北京八五事件和所谓“红八月”期间她都没有参与行凶，甚至在“红八月”后期还跑到湖北去了。既然如此，在这两个问题上，宋彬彬想要摆脱耻辱并不困难，她所需要做的就是讲出她知道的事件真相，并就拖延讲出真相而道歉。作为当时的师大女附中学生领袖之一，宋彬彬至少是知道部分卞仲耘案凶手的姓名的。除此之外，她还应该正面回应卞仲耘家属的疑问。

真正困难的是，宋彬彬如何面对在1966年8月18日要求她“要武”的毛泽东，因为毛泽东和中共政权才是真正将她牢牢钉在耻辱架上的罪魁祸首。数十年来宋既不指出卞案凶手姓名，也不公开批评毛泽东，更不指责实际在维持她丑恶形象的中共，那么她现有的道歉确实不足以把她带下耻辱架。

为何数十年来宋彬彬都不能彻底澄清她在卞仲耘案和红八月期间并未犯下打人的暴行？

首先当然是中共将文革视为最大的历史负资产之一，尽可能地压制一切关于文革的独立研究，扭曲历史事实、封锁真相，以至于人们普遍缺乏对文革的客观认识。在真相被压制、论述不自由的情况下，人们的看法很容易受到官方的误导，好似文革中除了红卫兵、造反派、林彪和四人帮之外就没有别人做过坏事。无怪乎宋彬彬道歉一出，一般民众甚至以为宋在撒谎，而几位有名的文革学者却都能接受宋的说法至少是真实的。

其次更是因为卞仲耘案和红八月事件中的真凶都牵涉到很多中共高干子女，所以中共不愿意追究责任。实际上中共高层在文革后出于复仇的动机发起了一场“清理三种人运动”，其中就包括要清理文革中的“打砸抢分子”等，但是当清算进行到触及老红卫兵在文革初期犯下的暴行时就无法进行下去了。1984年原中共情报系统头目孔原之子孔丹给中共二号人物陈云写信，表示老红卫兵与造反派有本质区别，不应再被追究。陈云同意老红卫兵不属于“三种人”，还说其中好的应该列入提拔对象。陈的意见得到中共一号人物邓小平和总书记胡耀邦等人的一致支持，中共正式发文制止了对老红卫兵的清算，北京市主导的对文革期间北京中小学命案的调查被迫停止〔30〕。既然中共高层从总体上刻意掩盖自己子女的罪责，卞仲耘案真凶得不到追究，那宋彬彬就还得代人受过，无法洗脱自己的罪名。

宋彬彬要摆脱8月18日毛泽东对她说“要武”的耻辱，仅靠轻飘飘的说一句自己从未使用过“宋要武”名称是不够的。即便这是事实，即便“要武”是毛讲的玩笑话，但这句话造成的实际恶果是无法否认的，“宋要武”已成为红卫兵暴力的标志性符号。正如叶志江所说“宋彬彬成为追索的主要目标恐怕并不完全在于她在卞仲耘之死上所负的责任，而是因为宋彬彬或宋要武已成为红卫兵运动初期的政治符号，就像蒯大富成为红卫兵运动后期的政治符号一样。蒯大富已用十七年的牢狱生涯来偿还他的债务，宋彬彬等人又该如何偿还他们的债务呢？”〔31〕虽然宋要武未杀人越货，但很多各类“要武”者在文革后未受到中共真正的清算（只清理某一派“要武”者的事情是有的），因此宋彬彬就要批评中共对“要武”的态度，才能摆脱“宋要武”给她带来的耻辱。

宋彬彬为“宋要武”这个符号背负数十年骂名，最好的呈现出中共政权的蒙昧和暴力本质。正是爱好和迷信暴力的毛泽东和中共给宋彬彬加上了“宋要武”这个暴力符号，而正因为中共通过蒙昧和限制言论自由来维护统治，使得宋彬彬数十年来没有机会澄清她是被强加上“宋要武”符号的。作为极权核心成员的子女，她既从此政权享受了好处，也承担了此政权带给她的伤害。她能送袖章一个重要原因是她父亲宋任穷几天前刚进入中共政权的核心即中央政治局，在天安门上维持秩序的公安部长谢富治认识宋任穷才准许她向毛泽东送袖章，才有机会让毛和她进行“要武”的对话〔32〕。宋彬彬以她兼有极权核心层中受益人和受害人的双重身份，来批评毛泽东和中共暴力文化对她造成的伤害，才最有力量，最能彻底解脱毛和中共体制给她造成的屈辱。

除非宋彬彬直接批评强加给她“宋要武”符号的毛泽东和中共，她终将只能成为中共的牺牲品，这也就是为何徐贲说为文革过错道歉必须包括“极权帮凶”罪〔33〕。笔者正是在研究中共历史中不断接触并认识到中共“蒙昧和暴力”这一本质，所以为10年前年轻无知时曾加入中共而深感羞耻并早已断绝与其联系、自行退出。

草稿：2014.2.20

完稿：2016.2.4

注释：

〔1〕华新民、何蜀、杨隼为本文的修改提出了有价值的意见，在此表示感谢，当然文章存在的问题由笔者负责。本文已选入天问联合学会即将出版的《红祸——文革发动五十周年论文集》，网刊《昨天》2016年3月第66期发表本文时对第三部分做了重大删节。

〔2〕王友琴《女性的野蛮》，见《女博士生校园随笔》，北京出版社，1988年9月。时至今日，王友琴仍在坚持调查文革遇难者的情况，并于2000年和李晓林等人合作建起网上文革受难者纪念园，这个纪念园已是研究文革遇难者最重要的资料来源之一。

〔3〕王友琴，《北京第一个被打死的教师——卞仲耘》，  
<http://www.aisixiang.com/data/5338.html>?爱思想网，2005年1月10日。

〔4〕冯敬兰等，《也谈卞仲耘之死》，《记忆》总第47期，2010年4月28日。

〔5〕宋彬彬，《四十多年来我一直想说的话》，《记忆》总第80期，2012年1月31日。

〔6〕《师大女附中“老三届校友与老师见面会”发言》，《记忆》总第108期，2014年2月15日。

〔7〕《编读往来》，《记忆》总第48期，2010年5月15日。

〔8〕印红标，《文化大革命中的武斗》，香港《中国研究》，1996年秋季号，第2期。

〔9〕陈闯创，《略谈文革初期没有“红卫兵运动”和“造反派”》，《昨天》第48期，2015年3月30日；原载于吴称谋主编《历史期待拐点——重审文革与探索未来》，纽约：中国独立作家出版社，2014年3月。至今没有资料完整列出1966年8月前在北京到底有哪些中学存在名叫“红卫兵”的团体以及每个团体究竟有多少成员。现在只知道有一所大学在8月前就已有红卫兵，是成立于6月18日的北京矿业学院红卫兵，见方迪《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一司”兴衰始末》，华夏文摘增刊第654期，2008年6月23日。就连北京市东城区也直到1966年7月下旬才出现了红卫兵组织，见《中共北京市东城区大事记》1997年版。

〔10〕《刘少奇邓小平六七月间关于文化大革命的一些指示》，引自宋永毅主编：《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服务中心出版，2006年（第二版）。

〔11〕宋柏林，《红卫兵兴衰录——清华附中老红卫兵手记》，香港：德赛出版有限公司，2006年6月。

〔12〕以上关于彭小蒙的内容，参见宋柏林《红卫兵兴衰录——清华附中老红卫兵手记》，卜伟华《红卫兵运动的兴起》。关于彭小蒙当众打张承先的时间存在争议，笔者选取8月4日的说法，见谢定国《一个北大学生的文革日记》（华夏文摘增刊第955期，2014年8月18日）和《北京大学1966大事记》（《记忆》总第114期，2014年5月31日），但大事记上未提到彭的名字。

〔13〕《迷狂的音符》，选自秦晓鹰《历史的错位》，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文中说歌曲是依据6月4日阎恒《文化革命干一场》快板诗改编的，7月1日改名为《造反歌》，原稿中似无“造反”字样。

〔14〕石兴国，《北航红旗诞生》，  
[http://blog.sina.com.cn/s/blog\\_da99d3a80101nirc.html](http://blog.sina.com.cn/s/blog_da99d3a80101nirc.html)? 新浪博客 2013年8月20日。

- (15) 王年一,《文革漫谈》(删节版),香港《二十一世纪》2006年10月;中共上海市委办公厅革命造反派编《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上海地区两条路线斗争大事记》,1967年11月,引自宋永毅主编《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
- (16) 1966年8月18日《周恩来接见北京三十一中“七一”赤卫队队员时的谈话》,引自宋永毅主编《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2006年版。
- (17) 《清华大学志》,清华大学出版社,2001年4月。
- (18) 一听,《广州红卫兵运动的兴起》,华夏文摘增刊第271期,2001年10月22日;何蜀,《对文化大革命历史分期的思考》,华夏文摘增刊第316期,2002年12月2日。
- (19) 966年10月25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引自宋永毅主编《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2006年版。
- (20) 李红云,《师大女附中红卫兵是何时成立的》,《记忆》总第102期,2013年9月30日。
- (21) 冯敬兰等,《也谈卞仲耘之死》,《记忆》总第47期,2010年4月28日。
- (22) 李红云,《师大女附中红卫兵是何时成立的》,《记忆》总第102期,2013年9月30日。
- (23) 启之,《关于文革研究的新思路——金大陆教授访谈录》,《记忆》总第79期,2011年12月30日。
- (24) 卜伟华《把史实搞清楚是最重要的》  
[http://www.2lccom.net/articles/ljsj/ljsjj/article\\_20140207100033.html](http://www.2lccom.net/articles/ljsj/ljsjj/article_20140207100033.html) 共识网 2014年2月7日。
- (25) 王友琴,《女性的野蛮》,1988年;冯敬兰等《也谈卞仲耘之死》,《记忆》总第47期,2010年4月28日。
- (26) 不过师大女附中“红旗”和“红卫兵”同为高干子女组成的老红卫兵,到校外打击平民子弟造反派的做派差别不大。“红旗”的梁二同8月24日参加了臭名昭著的清华红色恐怖“八二四事件”,而“红卫兵”的邓榕则参加了9月6日西纠与地质学院东方红在地质部的冲突。见许爱晶《清华蒯大富》,香港:中国文革历史出版社,2011年,第133页;《王大宾回忆录》,香港:中国文革历史出版社,2015年,第35页。
- (27) 王晶珪,《关于宋彬彬刘进虚伪道歉的声明》,纵览中国网站,2014年1月29日。
- (28) 冯翔,《王晶珪:“我,没有忘记历史”》,《南方周末》,2014年3月13日。
- (29) 王友琴,《李讷、林豆豆、宋彬彬》,香港《开放》2012年2月号。
- (30) 华新民,《卞仲耘命案争论拾遗》,华夏文摘增刊第956期,2014年8月19日。
- (31) 叶志江,《难言的历史一定有难言的故事》,2010年5月25日。
- (32) 冯敬兰等,《也谈卞仲耘之死》,《记忆》总第47期,2010年4月28日。
- (33) 徐贲,《为什么有的“文革道歉”不能被接受》,财新博客,2014年2月? 17日。

---

本期编辑:

华新民(美国)

《华夏文摘》执行编辑:

思语(美国)

《CND》总编:

陈天寒(美国)

《华夏文摘》网址: <http://www.cnd.org/>, 国际刊号 ISSN 1021-8602

投稿专用地址: [tougao@cnd.org](mailto:tougao@cnd.org) 其它事项请电邮: [cnd-cm@cnd.org](mailto:cnd-cm@cnd.org)

---